

「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

——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

高明士*

摘要

「日本」(yamato)國號與「天皇」(sumera-mikoto)號成立於何時？學界說法紛紜。拙稿以為「日本」國號在 668 年頒行所謂《近江令》之際，當已出現。670 年，武則天從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得知改國號一事，乃諭令將「倭」(yamato)改稱「日本」(yamato, hi-no-moto)。2011 年在西安發現的「(百濟人)祢軍墓誌」(卒於 678 年)，誌文中提到「日本」，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金石文當中最早提到「日本」的，也是在時間上最接近 670 年成立「日本」國號的證據。就當時的唐朝官方的認定而言，「日本」國號在 670 年成立，應可塵埃落定。

隨著國號的改稱，到天武朝(673-686)時，也將以往的王號或大王(ōkimi)號改稱為「天皇」(sumera-mikoto)，此由最近在奈良地區發現的木簡，出現「天皇」一詞，可作旁證。所以日本的「天皇號」，當初定於 681 年進行編纂的《淨御原令》。到 702 年《大寶令》、757 年《養老令》頒行時，更為完備。

由「日本」國號及「天皇」號的出現，可知自大化革新以後，日本積極仿唐建設法制國家；八世紀之際，日本的律令國家建設，已建制以天皇為頂點的「專制君主制」。

關鍵詞：日本國號、天皇制、井真成墓誌、杜嗣先墓誌、祢軍墓誌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一、前言

100 年高中新歷史課綱選修課程《世界文化史》當中，有一小節要說明「日本天皇制的起源」，但遍尋國內相關著作，包括概說或通史書刊，並無直接可供參考。¹日本學術專著，則有較多討論「天皇制」問題，但仍說法紛紜。此次國內新訂課綱當中，居然將此一問題列入高中歷史教材，雖說是選修課程（高三用），但編寫教材與教師教學之困難，概可想見。

關於日本「天皇」制的起源，其實也關係「日本」國號的起源。最直接的發展方式，是由「倭」國演變為「日本」國，由稱「王」演變為稱「天皇」。其問題所在，一、「倭」國為何改稱「日本」國？這樣的演變始於何時？二、日本稱王以外，還有稱大王、天王等，乃至稱天皇、皇帝。所以討論「天皇制的起源」時，其著力點應該放在何處？三、稱「天皇」與「日本」國，兩者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兩者都是日本自稱還是由當時中國改稱？以上諸問題，都不是目前所見的文獻所能解答，學界因而努力從考古金石文中去找直接材料，可惜迄今仍未能獲得滿意的答案。所幸藉由最近發現的墓誌以及木簡，可以有較明朗的答案。以下試圖作解說。

二、日本國號的成立

「倭」國為何改稱「日本」國？這樣的演變始於何時？此事在日本古代文獻尚無答案，只有從中國史書來找。中國史書向來有二說，一說是日本自己改稱；一說是武則天改稱，時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

前者，倭國自己改稱，見於《舊唐書·東夷·日本國》，其

¹ 例如鄭樵生，以為「天皇」一詞在推古二十八年（620）起開始使用（參看鄭樵生，《日本古代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頁138），但缺乏證明。馮瑋雖對「天皇」、「日本」稱呼的起源有些討論，而採納始於天武十年（681）開始編纂的《飛鳥淨御原令》說。但因都是採用他人之說，同時缺乏引證論述，所以說服力低。參看馮瑋，《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頁77-84。

曰：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

此即指出有兩種說法：一為依據其地理位置，以為在太陽的（東）邊，所以改稱為「日本」。杜佑《通典》，卷一八五，〈邊防典·序〉注說：

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近於日出處。

同書〈邊防典·東夷上·倭〉也說：「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卷一八五）。《舊唐書》另一說法，以為原來用「倭」字不雅而改稱。但《唐會要》，卷一百，〈日本國〉條曰：

日本，倭國之別種。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國為名。或以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吞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

《新唐書·東夷·日本國》的記載與《唐會要》雷同，但與《舊唐書》稍異，其曰：

（高宗）咸亨元年（670），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此即指出改稱「日本」的原因有三種說法：近日所出或惡倭名不雅兩說，均同《舊唐書》，時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以河內鯨為使至唐賀平高麗。惟《新唐書》認為「惡倭名，更號日本」一事，是在「咸亨元年（670），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的結果，也就是更號為日本的時間，至少在咸亨元年（670）以後。但從其他諸書的記載看來，670年倭使還

沒來賀平高麗之前，在國內似已經先改用「日本」，所以「使者自言」、「自云」。至於近日所出之說，又見於《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條曰：「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當取材自《新唐書》。但《唐會要》與《新唐書》又有說法相反之處，此即《唐會要》以為「日本」本來是小國，結果吞併倭領土後而採用「日本」名稱；但《新唐書》則以為倭吞併「日本」小國，取其名改之。足見「倭」國為何改稱為「日本」國一事，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的朝廷，尤其鴻臚寺，對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節團當中，無法取得一致的說法，導致諸史籍記載紛紜，朝廷因而懷疑日本使臣多不講實話。

後者，武則天改稱的說法，見於《史記》，卷二，〈夏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說明百濟之後，按曰：「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帝舜〉張守節《正義》同樣引《括地志》說明百濟之後，按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兩處均簡單說明倭國改稱「日本國」是由武則天所改，但改於何時？依然不明。按，張守節生卒年不詳，根據其著作《史記正義》（三十卷），〈序〉說：「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序文末說該序寫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由此往上追溯其治學起始時間，當在武則天建周稱帝時期，即久視元年（700）前後。只是張守節稱武則天為「武皇后」，這是採用開元時期的稱呼。武則天何時改稱日本？若由高宗自顯慶以來因風疾而漸不能問政，麟德元年（664）十二月殺上官儀後，武后垂簾聽政，與高宗號稱「二聖」一事看來（《舊唐書·高宗本紀》），仍當以咸亨元年（670）改稱倭為日本。其因，或許由於倭使對改稱「日本」之理由有不同講法，唐廷無法採擇，乃由武后代高宗裁定，改倭為「日本」。²若再參照最近發現百濟人「祢軍墓誌」所示（詳後），

² 自江戶時代國學者本居宣長以來，對《日本書紀》的「倭」與「日本」，均訓讀為「ヤマト」（yamato）（參看岩橋小弥太，《日本國號》，東京：吉川弘文館，1970，頁173-174、189）；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東京：岩波書店，1965）亦同。此即唐高宗、武則天在咸亨元年（670）以後規定使用不同漢字，但在古日語音讀仍然相同，這一點值得注意。

「武皇后改曰日本國」一事，推斷在高宗咸亨元年，應可接受。張守節在《史記正義·序》記述此事時，雖已距武皇后改倭為日本時有六十多年，就目前傳存的文獻而言，仍然是最直接的說明，可信度高。

由以上所述，「日本」國號取代倭國名稱，在本國當始於 670 年稍前，或定於天智天皇即位後所頒的《近江令》（668）；在中國的定位，則確立於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則天后干政之際。

至於稱「天皇」與「日本」國，兩者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就法制的建制過程而言，兩者難以直接劃等號，但至少代表日本古代國家建制君主專制政體的過程。蓋自 645 年實施「大化革新」以來，即以唐制為榜樣，逐步法制化，尤其模仿唐制建設以皇權為頂點的國家。其邁出的第一步，恐即先將「倭」改稱為「日本」。此事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遣使至隋，使者答文帝問風俗，說：「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³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隋書·東夷·倭國傳》）已透露其施政是以「日」為中心。至煬帝大業三年（607），倭又派遣小野妹子為使至隋，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同前引《隋書》）即以倭國所在為「近日出處」，已經寓有「日邊」之意，這樣的地理觀念，恐與國內佛教盛行有關。此即《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書《大智度論》卷九說：「如經中說：『日出處是東方，日沒處是西方，日行處是南方，日不行處是北方。』」所以《隋書》在記述此國書之前，引其使者說：「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此時之倭使者顯然以為彼等來自「海東」，其國書曰：「日出處」云云，看來與其「海東」的東、西方位觀有關。而學佛法是此次遣隋使重要目的之一，所以「近日出處」、「日邊」的說法，或許源自佛典的方位

³ 井上光貞以為倭國王是天的貴男子，這樣的「天」、「日」關係，或與日本神話中「日之御子」族人是從天上的「高天原」下降到人間而成為習俗有關，但不為隋文帝所接受，而訓令改之。（參看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68）。

觀⁴，但與倭國的「天下」觀無涉。只是國書文字所反映的對等觀念，觸犯隋煬帝天下秩序的大忌，乃將倭國國書視為「無禮」。無論如何，「近日出處」、「日邊」說，或許可視為「日本」國號成立的主要源頭。

然則何時將「倭」改稱為「日本」？筆者以為在《近江令》頒行之際。按，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後，在新都近江大津開始從事法制建設，頒行所謂《近江令》，但學界對此事贊否皆有，否定論者以為缺乏直接證據。由於接著頒行朝廷禮儀、行路相避、冠位制度以及「庚午年籍」的戶籍制度等，至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制實施。在此前提下，進而將「倭」改稱「日本」，以更符合其政治體制。如此才能解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同前引《唐會要》）

最近七、八年來新發現的墓誌，有三個直接關係「日本」國號的成立，轟動一時。此即 1.「井真成墓誌」、2.「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3.「（百濟人）祢軍墓誌」，尤其後者「祢軍墓誌」。茲再略為說明。

關於 1.「井真成墓誌」。

2004 年 4 月已知有收藏家藏有「井真成墓誌」，至 10 月，終歸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10 日並由該大學發佈此訊。由於墓誌銘文開始記載：「贈尚衣奉御井公墓並序：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下略）」此一消息披露後，立即震憾中日學界。蓋有關「日本」國號究竟始於何時，學界說法紛紛，此墓誌的發現，被認為是最早的證據，日本、大陸隨即召開若干研討會，到 2011 年至少有五十篇論文發表。⁵

⁴ 最近森公章亦持此說，並以為起草此國書者或為聖德太子（厩戶王）師高句麗僧慧慈。（參看森公章，《遣唐使の光芒》，東京：角川學藝出版，2010，頁59）過去學界對此國書的解讀，大都是由政治意識的對等立場與否來考量倭國立場，增村宏也不以為然，主要是由倭國對當時的政治環境沒有深入瞭解，而較單純由方位來思考，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增村氏對學界的批判，也值得參考。（參看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第一編〈遣隋使問題再檢討〉所收四篇論文，京都：同朋社，1988，頁1-197）。

⁵ 有關「井真成墓誌」研究的簡介，參看賈梅，〈唐「井真成墓誌」研究綜述〉，

誌文中提到「國號日本」，應該成立何時？學界有爭論。論者乃由井真成何時入唐作解釋，但誌文對此事無具體答案。誌文末記載井真成卒於玄宗開元廿二年（734）正月，年三十六，依其經歷推算，其入唐時間，有謂在開元五年（717，第九次遣唐使），但也有主張在開元二十一年（733，第十次遣唐使），這是依其身分來推斷，前者以為是遣唐留學生（請益生？），後者以為是官人。到目前為止，似以留學生說較多，即以 717 年入唐說為主流。⁶這樣的說法，留下幾個問題：第一、誌文並無明記何時將「國號日本」傳入唐朝；第二、就撰寫此誌文的認知而言，「國號日本」的訊息，從井真成入唐到開元廿二年(734)正月去世為止，這期間都有可能傳入；第三、就誌石而言，「國號日本」出現的時間，宜以墓主卒年（734）而撰寫誌文的時間為下限。筆者採取較保守的看法，以為「國號日本」出現的時間，宜設定在撰寫誌文者當時的認知為據，此即 734 年。若往前追溯「國號日本」一詞出現的時間，必須對墓主經歷再作史實考證，以誌文資料而言，實難具體認定在何年。以下兩誌石出現「國號日本」的時間認定，筆者仍採撰誌時間的保守看法。由於文獻記載「日本國號」的成立，早於此誌石。因此，不論何種主張，此誌石不能作為「日本國號」成立最早的證物。

關於 2.「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

2004 年 10 月 10 日由大陸西北大學發佈「井真成墓誌」新聞後，日本《朝日新聞》於 10 月 11 日立即以頭版消息發佈此訊。從此以後引起日本學界對成立「日本」國號的證物一事，予以廣

《碑林集刊》，12（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發行，2006），頁167-172；拜根興，〈杜嗣先、井真成墓誌與唐代中日關係研究〉《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頁1-7。在專書論文集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為（日本）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東京：朝日新聞，2005.7），內中共收24篇論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池田溫，〈「井真成墓誌」をめぐって〉一文，同時開列「古代日本人墓誌一覽」，共收18件；另外也指出在中國所發現的墓誌，共有6,828件，數目龐大。（頁210-214）高橋繼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一文（頁316-330），也值得參考。

⁶ 參看前引拜根興，〈杜嗣先、井真成墓誌與唐代中日關係研究〉，頁5。

泛關注，尤其高橋繼男教授。他在蒐集相關研究成果時，發現臺灣大學葉國良教授於 1995 年發表〈唐代墓誌考釋八則〉（《台大中文學報》第 7 期），其中一則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亦作考釋。此文後來收入葉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據葉氏說，此墓誌（其實是夫婦二碑石）是在臺北一家專門賣骨董的「寒舍」店發現，當時因開價太貴，無法購買，徵得店主同意而用筆抄錄。其發表論文的依據，就是這個抄錄文。當發現「井真成墓誌」而被認為是成立「國號日本」最古證物時，高橋教授卻發現〈杜嗣先墓誌〉記載「皇明遠被，日本來庭」的時間，比「井真成墓誌」更早。蓋墓誌（由其子維驥撰）說：「（杜嗣先）粵以先天元年（712）九月六日薨于列祖舊墟偃師之別第，春秋七十有九。以二年（713）二月二日與夫人鄭氏祔葬于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下，禮也。」遺憾的是該墓誌石已不知所在，即連拓本也沒有，所依據的只是葉氏個人筆錄，作為第一手資料，不免降低說服力，惟從整個誌文看來，應無造假。至於有無抄錯，則有待考證。

根據此誌文，可知「日本來庭」是指第八次（長安二年，702）遣唐使上朝時，武則天在大明宮麟德殿饗宴遣唐使栗田真人等，杜嗣先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人列席。⁷據此而言，有學者推斷「日本」國號在 702 年已經出現。⁸惟筆者以為此誌石之撰刻應該在先天二年（713）二月下葬之際，長安二年（702）「日本來庭」，是時間的追溯。所以此誌石所見的「日本」國號，宜設定在先天二年（713）二月，仍較「井真成墓誌」的 717 年說為早。⁹

⁷ 參看金子修一，〈則天武后と杜嗣先墓誌——栗田真人の遣唐使關と連して〉（《國史學》，197號（東京，2009.2），頁1-4。

⁸ 韓昇從文獻及此誌石，而推斷「日本」國號是在大寶元年（701）「頒佈」《大寶律令》。參看韓昇，《海東集——古代東亞史實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9-18。按，《大寶律令》於701年編成，702年頒行，若取頒佈之年，宜曰702年。

⁹ 高橋繼男是以717年計，參看前引高橋繼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頁316-330；葉國良是以702年計，參看葉國良〈從二重證據法看

自 2005 年到 2011 年為止，「杜嗣先墓誌」的「日本」國號說，已經取代「井真成墓誌」。但是到 2011 年在西安發現「（百濟人）祢軍墓誌」，又推翻「杜嗣先墓誌」說。

關於 3. 「（百濟人）祢軍墓誌」

百濟人「祢軍墓誌」是 2011 年 7 月由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王連龍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文末附「大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祢公墓誌銘并序」拓本圖片，誌蓋陰刻篆書四行，每行 4 字，四殺飾以幾何紋樣。誌石高廣 59 公分，厚 10 公分，四側豎面陰刻蔓草紋。誌文凡 31 行，滿行 30 字，共計 884 字。¹⁰（參看附圖一）但文中並無說明祢軍墓誌在何處發現。最近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拜根興先生告知原來祢軍墓被盜掘，現在陝西西安市公安局已經破獲此盜墓案，並收繳該誌石，將來可能將該誌石交給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祢寔進的兒子、孫子墓誌即存放於該研究院）。¹¹

「祢軍墓誌」文首記載：「公諱軍，字溫，熊津嶠夷人也。」其下接著記述其家族世系及任官經歷功業，誌文記載：「曾祖福、祖譽、父善，皆是本藩一品，官號佐平。」可見祢氏家族在百濟是顯赫貴族。又記載：「去顯慶五年（660），官軍平本藩日，見機識變，杖劍知歸。」此即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平百濟時，祢軍與其弟寔進陣前倒戈降唐，而加速百濟滅亡，唐擢授右武衛滄川府折衝都尉。因當時唐與日本關係緊張，誌文提到：「于時日本餘噍，據扶桑以逋誅。」此處之「日本」國號，正是迄今所見金石

「日本」國號在中國的出現》，《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 2 號（專修大學社會知性開發研究センター，2009.3），頁 59-67。

¹⁰ 王連龍，〈百濟人「祢軍墓誌」考論〉《社會科學戰線》，193 期（吉林：吉林省社會科學院，2011.7），頁 123-131。附圖一引自頁 131 附圖。此文係由西北大學王維坤教授所贈，特此申謝。2012 年 2 月 25 日，由氣賀澤保規教授主持，在日本明治大學召開「新發現百濟人「祢氏墓誌」と 7 世紀東アジアと『日本』」國際研討會，邀請大陸王連龍、張全民兩位先生以及日本學者金子修一、田中俊明等參加。「祢軍墓誌」研究已受到重視，可見一斑。

¹¹ 最近高麗、百濟移民唐朝的墓誌研究受到重視，參看拜根興，《唐代高麗、百濟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陽出土墓志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文末附「高麗移民墓志資料匯集」（共收 21 件）、「百濟移民墓志石刻資料匯集」（共收 11 件）；拜根興，〈唐代百濟移民祢氏家族墓誌相關問題研究〉，《當代韓國》，73 期（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6），頁 94-107。

文中最早提到「日本」者，足以推翻學界依據上述兩個誌石所作的推論。所謂「餘噍」，李連龍引《梁書·元帝本紀》大寶三年（552）二月，由於侯景叛變，元帝檄文中，說：「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即指殘留性命者，或遺民之意。逋誅，為逃避誅罰之義。兩句實含有譴責日本之意。此誌文又提到「扶桑」，也是金石文中最早見到者，此處仍當指日本，是為避免重複使用的替代詞。祢軍於麟德年間（664-665）有兩次與郭務悰、劉德高奉派赴日本處理唐、日關係。此事兩《唐書》失載，由誌文及《日本書紀》、《善鄰國寶記》所引《海外國記》可知。回國後，曾到百濟招撫遺民，並在討滅高句麗戰爭中立功。誌文記載咸亨三年（672）十一月，官職晉位為右威衛將軍；儀鳳三年（678）二月十九日卒於雍州長安縣延壽里第，享年六十六。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祢軍墓誌」所見的「日本」國號，以儀鳳三年（678）計，仍為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670）由倭改為「日本」國號的誌石，實可強化咸亨元年（670）說，彌足珍貴。「井真成墓誌」及「杜嗣先墓誌」所見之「日本」為最早證物說，已不攻自破。當然每個墓誌均有其特定之歷史意義，仍有研究價值，但不在拙稿討論範圍。

三、「天皇」制的起源

關於「天皇」制的起源問題，在日本古代史上含有以下諸問題：首先，關於日本稱王以外，還有稱大王、天王等；稱天皇以外，還有稱皇帝。也就是討論「天皇制的起源」時，其著力點應該放在何處？對於這個問題，第一應考慮何時出現稱「天皇」？其次，是討論「天皇」號的前身為何？就資料而言，則除文獻記載外，尚須以古金石文材料作印證。就文獻記載而言，日本最古的文獻，具有史料價值的，如《古事記》（712年）、《日本書紀》（720年）、《萬葉集》（約759年）等，都是在八世紀之際編成，但對早期有關天皇記事，尤其在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九代天皇，實為虛構，學界早已有共識。其下皇紀雖都稱天皇，仍不能作為

天皇稱號已經出現的證據。

「天皇」稱號不可能突然出現，正如中國「皇帝」稱號的出現一樣，其前身應該還有一段歷史發展背景。有關日本古代史的文獻資料，必須仰賴中國史書記載，尤其《隋書》以前的史書，甚至兩《唐書》都有珍貴資料。透過中國史書及金石文，可知日本「天皇」稱號的前身為「王」或「大王」。

金石文方面，如眾所周知，東漢光武帝曾賜給倭之奴國王金印，印文曰：「漢委奴國王」，「委」即「倭」之古字，金印所稱倭之奴國，為當時倭國小國林立之一。至曹魏明帝亦曾賜給倭之邪馬臺國卑彌呼女王金印，印文曰：「親魏倭王」。而《宋書·倭國傳》記載倭五王事蹟，並有倭王武（通常是比定為雄略天皇）於宋順帝升平二年（478年）的上表文，此為文獻上首次登載的國書。五世紀或六世紀的金石文中有「大王」的稱呼，¹²可與《宋書》相呼應，此時之倭國，已經統一諸小國分立的局面，即所謂大和王權，以奈良盆地等近畿地區為中央權力機構所在，統治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地區，「大和」後來也成為日本的別稱。江田船山古墳「鐵刀銘」有「治天下」「大王」，埼玉稻荷山古墳「鐵劍銘」有「左治天下」的記載，這也是首見使用「天下」一詞。

就文獻而言，701年編成、702年頒行之《大寶·公式令》所見「御宇日本天皇」之稱，是為「天皇」稱號出現的下限。¹³但論

¹² 例如和歌山縣隅田八幡宮「銅鏡銘」（有「癸未年」記年）、埼玉縣行田市埼玉稻荷山古墳「鐵劍銘」（有「辛亥年」記年）、熊本縣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等。參看齋藤忠，《古代朝鮮·日本金石文資料集成》（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頁29-32、388；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稱號の由來について〉收入《宮崎市定全集》，21（東京：岩波書店，1993第一刷，2000第二刷），頁279-281（原刊《思想》，646，1978.4），頁279-281；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東京：講談社，2001），頁112-115。又，宮崎氏在前引文以為「大王」是屬下對倭王的敬稱，並非倭王自稱，另主張稱「天王」，但至今金石文皆無發現，此說暫不取。

¹³ 《令集解》卷31《公式令》「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條引《古記》曰：「『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對鄰國及蕃國而詔之辭。」足見《養老·公式令》開頭增加「明神」兩字，而「御宇日本天皇詔旨」當是《大寶·公式令》條文。按，《大寶令》頒行於702年（文武天皇大寶二年），但因佚亡，今日只能由《令集解》所引明法家的《古記》等復原片斷。

天皇稱號的起源，勢必再往上追溯，學界對此問題，大致可分為兩說，一為起源於推古朝，一為起源於天武、持統朝。

關於推古朝說，較直接的證據，是由天壽國繡帳銘文所見四處提到「天皇」的文字，此外也有引用法隆寺金堂藥師如來像的光背銘，提到「治天下大王天皇」等用語，此等處的「天皇」，被認為是指推古天皇。但目前學界對二者製作時間，較傾向是天武、持統朝時期法隆寺重建時期，所以推古朝說較難說服人。¹⁴

此外，《隋書·東夷·倭國傳》說：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煬帝）大業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

所謂「阿每」，和訓為「アメ」(ame) 或「アマ」(ama)，是天的意思。「多利思比孤」和訓為「タリシヒコ」(tarisihiko)，是男子的尊稱。將姓和字合起來，直譯為天之高貴男子，¹⁵宜解為「天子」，這是藉漢音表日語，也就是所謂假名。至於「阿輩雞彌」如何解釋？高宗、武后時期的張楚金所著《翰苑》「倭國」條記載：「阿輩雞彌，自表天兒之稱。」雍公叡（唐文宗大和以前人）注說：「今案，其王姓阿每，國號為阿輩雞（脫「彌」字），華言天兒也。」¹⁶注文顯然取自杜佑《通典》，其卷一八五〈邊防典·東夷·倭〉說：

¹⁴ 參看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頁 336-338。吉村武彥對學界舉考古文物共有五種（含拙稿中所舉二種），證明推古天皇（592-628）或稍晚的天智天皇（668-671 在位），「天皇」稱號已經出現的說法，提出反駁；呂玉新引用吉村氏說法，再參照東野治之、渡邊茂等論述，認為上述說法不能成立，再參照其他木簡資料，而提出天武十年（681），「天皇」稱號存在說，此與拙說相近。參看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 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頁 198-202。

¹⁵ 參看前引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頁 68。

¹⁶ 張楚金著、雍公叡注，竹內理三校訂·解說，《翰苑》（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圖版頁 62。雍公叡為唐文宗大和以前人，係採納內藤湖南的看法，參看竹內氏〈解說〉，前引《翰苑》，頁 147。按，此書為日本太宰府天滿宮所藏之國寶，亦為天下孤本。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¹⁷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

此處需要再解說者為「阿輩雞彌」，其和訓為「アハケミ」（ahakemi）¹⁸，音譯為「オオキミ」，（ōkimi）「大王」之意，¹⁹但張楚金說明是「自表天兒之稱」，此為倭人語言之原意；而杜佑則解為「華言天兒也」，成為杜佑個人以為是華語之意。此處當然應採用張楚金見解，但因杜佑說常為學界引用，特作辨明。「天兒」也是天子之意，大王亦稱天子，在中國自周以來早有其例，《日本書紀》亦有其例，不勝枚舉。

再者，倭使呈上煬帝的「無禮」國書，²⁰自稱：「日出處天子」（《隋書·東夷·倭國傳》），此處的「天子」，在其後頒行的《養老·儀制令》「天子」條規定「天子」是「祭祀所稱」，這是日本較特殊的定義。《令義解》對於「天子」稱號解釋說：「至風俗所稱別，不依文字，假如皇御孫命，及須明樂美御德之類也。」「皇御孫命」在日本古漢語訓讀為「スメミマノミコト」（sumemima-no-mikoto）；另外，《養老·喪葬令》「服紀」條，《集解》解釋「為君」一詞之意，說：「謂天子也。釋云：君，天皇。古記云：君者，指一人，天皇是也，俗云須賣良美已止也。」此處就《令義解》而言，仍釋為「天子」，但《釋云》、《古記》則解為「天皇」，因為這些註解家已是八世紀以後的明法家，不免含有當代的思考，但所謂「俗云須賣良美已止也」，才是傳統的用語，「須賣良美已止」訓讀為「スメラミコト」（sumera-mikoto），與前述「須明樂美御德」同，且與後來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賜給日本國王的國書，稱呼國王姓名「主明樂美御

¹⁷ 《隋書·東夷·倭傳》、《北史·倭傳》均無「其國」二字，《通典》此處衍。

¹⁸ 參看前引張楚金著、雍公叡注，竹內理三校訂·解說，《翰苑》，頁121。竹內氏訓讀。

¹⁹ 參看前引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頁68。

²⁰ 筆者對此事已有詳細的探討，參看拙著，《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中篇第五章〈倭給隋的「無禮」國書事件〉、第六章〈隋唐使臣赴倭及其禮儀問題〉。

德」，也只剩一字之差，其訓讀皆同為：「スメラミコト」（sumera-mikoto）。足見「主（須）明樂美御德」最基本是「天子」稱號的日文訓讀，「天皇」稱號建立後，才又增加具有天皇之意，但不是天皇的姓名。²¹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從隋煬帝大業三年（607）日本推古十五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至少就隋唐官方文獻，仍無稱日本國王為「天皇」，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²²至於《日本書紀》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608)八月記載倭王的答禮，有所謂「東天皇致書西皇帝」的國書，此事不見於中國史書，一般以為是《日本書紀》偽作，或是 607 年國書的改寫。此即《日本書紀》可能是將原來兩處的「天子」改為「天皇」、「皇帝」。所以也不能將此處的「天皇」視為該稱號已經出現的證據。

至於天武、持統朝說，學界持此看法較多，主要的理由在於唐高宗上元元年（674）稱「天皇」之號影響日本。其次，《日本書紀》天武二年（674）二月條記載冊立皇后、妃、夫人等記事，說明「皇后」號已存在，由此推論「天皇」號亦已建立，其制度化則在《淨御原令》。再次，《日本書紀》記載天武天皇崩，繼位者為持統天皇，對先帝之崩或喪事，直稱「天皇」。²³再者，更重的理由，在於 1998 年奈良飛鳥池遺跡發現書寫「天皇」的木簡（參看附圖二），²⁴連同其他木簡，而被推定為天武朝，這是到今日發現「天皇」稱號最早的史料。依此看來，「天皇」稱號的出

²¹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日本第九次遣唐副使中臣朝臣名代歸國之際，賜給該國王的國書稱呼日本國王姓名為：「主明樂美御德」，這是現存唐朝給日本唯一可見到的公文書。參看張九齡著、劉斯翰校注，《曲江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503。此國書又見《全唐文》卷287，西嶋定生等，《遣唐使研究史料》（東京：東海大學出版社，1987），頁233亦有收錄。參看拙著，《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350-353。

²² 《新唐書·東夷·日本傳》記載：「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顯然引自《日本書紀》，不足以採信。

²³ 以上學界探討有關「天皇」號的成立諸說，可參看大津透，《古代の天皇制》（東京：岩波書店，1999），第一章〈天皇號の成立〉，頁1-16；大津透，〈「日本」の成立と天皇の役割〉（收入《日本の歴史》，第八卷：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第一章，東京：講談社，2001），頁10-12。

²⁴ 附圖二引自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章前頁圖片。

現，應設定在天武朝（673-686），²⁵至持統（686-697）、文武朝（697-707）以後而進一步使君主號法制化，建立所謂「天皇制」。其時機，簡單說可能初定於《淨御原令》（681 編纂、689 頒行），至《大寶令》（701 編成、702 頒行）而法制化，《養老令》（718 編纂、757 頒行）更為詳備。

問題是「王」或「大王」的稱號變成「天皇」，其必然的淵源的關係為何？通說是受到唐高宗稱「天皇」的影響。按，唐高宗於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除追尊祖先外，並自稱為天皇，皇后（武則天）為天后，²⁶同時改元為上元元年；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崩，群臣上諡曰：「天皇大帝」。在時序上是可以成立的，只是日本自咸亨元年（670）遣唐使（第七次）歸國後，中斷三十一年，直至長安元年（日本大寶元年 701）才再有遣唐使的派遣（第八次）。²⁷其間如何將唐高宗稱天皇一事傳達至日本，則還有再考證的必要。²⁸

至於稱「皇帝」，見於大寶、養老《儀制令》。《義解》以為是「王者詔誥於華夷」，這樣的令文，當是直接抄錄自唐《儀制令》。²⁹實際用例，為聖武天皇至稱德天皇之際（從天平至神護景雲年間，729-769），在稱德之後繼位的光仁天皇就不再稱「皇帝」，這是由於三、四十年的征夷（蝦夷、蝦狄）內戰，導致國內不穩定，財政困竭，於是放棄追隨唐風、支配夷狄，諸蕃以王化

²⁵ 參看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プロローグ：「天下」の支配者〉，頁9-10；〈エピローグ：「天皇」の出現〉，頁333-347。

²⁶ 《資治通鑑》，卷202，〈唐紀〉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條接著說：「以避先帝、先后之稱。」但胡三省注說：「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為言，武后之意也。」

²⁷ 參看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4-6「遣唐使一覽表」。

²⁸ 從《日本書紀》可知在天武四年（675）七月癸卯條派遣大伴連國麻呂等赴新羅，至天武五年（676）二月返國；五年（676）十月甲辰條派遣大乙上物部連麻呂等赴新羅，至天武六年（677）二月癸巳返國。從這兩個年度派遣新羅使看來，頗疑此時即由新羅得知唐高宗稱「天皇」之事。

²⁹ 參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儀制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年初版，1964年覆刻發行），頁469。

天下的理論，而改求神明保護四方，王化境內國土。³⁰

日本在七世紀後半建立天皇制後，直至十世紀前半葉，其國家組織的特質，學界稱為律令國家時期。在特定貴族的支持下，天皇獨自保有如下諸政治權力：1. 建制官制，2. 任命官吏，3. 掌握軍權，4. 對臣下的刑罰權，5. 處理外交事務，6. 王位繼承權等。³¹ 這樣的天皇制，稱為「專制君主制」。直至十世紀前半葉，政權轉至武人，從此以後，直至明治維新為止，天皇權力被架空，成為虛位君主。

律令國家時期直屬天皇的官制，為太政官系統與神祇官系統，此即說明行政與祭祀並立，這一特質異於同時代的唐制。神祇官系統尤令人矚目，在令典，則有專屬的「神祇令」的令篇，亦為唐令所無。由官制系統似乎可反映日本古代天皇的神格性質，其淵源，當出自天照大神後裔的神話，同時王權又與女巫相結合之故，如邪馬臺卑彌呼女王者。也因此之故，天皇自始即無姓。³²

四、結論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後，制定行政組織，實施土地及賦役改革，積極仿唐建設法制國家，以確立王權支配體制。660 年，百濟為唐所亡；663 年，唐軍於白江口大敗流亡百濟軍隊及倭國水軍，倭國勢力從此退出朝鮮半島。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遷都於大津，頒佈《近江令》，以圖重新推行改革大業。同年，唐平高句

³⁰ 參看熊田亮介，〈夷狄・諸蕃と天皇〉（收入前引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第四章），頁 161-178。

³¹ 參看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國家》第三章第三節〈東洋的專制國家：天皇制と太政官〉（東京：岩波書店，1971 第一刷，1974 第五刷），頁 228-254；笹山晴生，《日本古代史講義》（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 初版，1983 八刷），頁 139-140。

³² 津田左右吉、福永光司等以為「天皇」稱號，來自中國道教天皇大帝的影響。參看福永光司等，《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東京：德間書店，1978）但因中國道教影響日本古代歷史甚微，所以此說不取。參看大津透，〈「日本」の成立と天皇の役割〉，收入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東京：講談社，2001），頁 11。

麗。669年，倭國派遣第七次遣唐使，賀平高句麗。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到唐朝上朝時，奏稱：「惡倭名，更號日本。」（《新唐書·東夷·日本國》）可見「日本」國號在670年稍前在其國內既已出現。就日本國內情勢而言，更改國號最有可能出現的時機，當即天智朝於668年頒行所謂《近江令》之際。但是在唐朝，雖於高宗咸亨元年（670），遣唐使來朝時，得知日本已由倭改稱「日本」，只是為何改稱「日本」？使者之間居然說法紛紛，乃由武則天確定使用「日本」國號。因此，從唐朝的立場看「日本」國號的成立，應設定在670年；從日本史的立場看「日本」國號的成立，應設定在668年《近江令》頒行之際。2011年發現的「（百濟人）祢軍墓誌」（卒於678年），誌文中提到「日本」，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金石文當中最早提到「日本」的，也是在時間上最接近670年建立「日本」國號的證據。670年建立「日本」國號，應可塵埃落定。

672年，日本爆發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和天皇胞弟大海人皇子，為爭奪皇位繼承權而發生長達約一個月的內亂。此即所謂「壬申之亂」。結果大友皇子被大海人皇子所敗，大海人皇子次年即位，此即天武天皇。國都由近江（滋賀縣大津市）遷至飛鳥淨御原宮（奈良），重建秩序，並改革制度，繼續推行中央集權措施。681年進行編纂《淨御原令》，689年頒行。1998年奈良飛鳥池遺跡發現書寫「天皇」的木簡，被推定為天武朝之物，這是到今日發現「天皇」稱號最早的證物。依此看來，以往的王號或大王號改稱為「天皇」，進而建立天皇制，可能初定於《淨御原令》（681編纂、689頒行），至《大寶令》（701編成、702頒行）而法制化，《養老令》（718編纂、757頒行）更為詳備。其淵源，可能受唐高宗稱「天皇」的影響。到八世紀之際，日本的律令國家建設，可說已建制天皇為頂點的「專制君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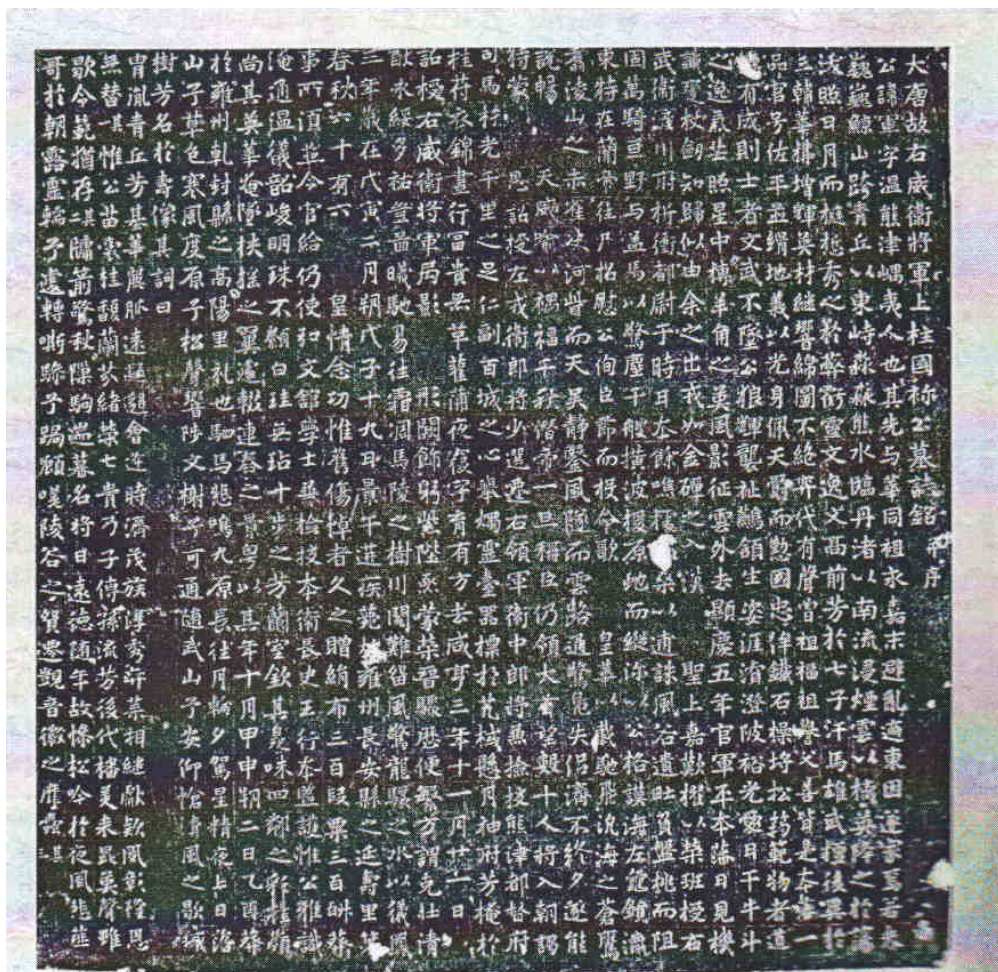
總之，日本自七世紀中葉以來，即積極力求鞏固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約半個世紀期，抑制豪強，數度派遣唐使，仿唐建立制度，中間經過在朝鮮白江口之役的大挫敗、王位繼承

之爭等內外困境，轉而從事內政建設，終於走出建制律令國家體制。最受令人矚目的表現，即將國號由「倭」改稱「日本」，進而由「王」（大王）號改稱「天皇」，以強化領導中心。兩者的建制，雖非同時，但透過法制建設，而致力於朝向鞏固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目標則不變，其動力即在東亞世界中謀求自立自強，而成為禮義之邦。³³

附圖一 （百濟人）祢軍墓誌



³³ 拙稿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附圖二 天武朝「天皇」本簡



The Origin of the Title of Japanese Country and the *Tennō* (*Tianhuang*) System —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Tomb Epitaph and Wooden Tablets

Kao, Ming-shih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dispute about the tim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Japanese Country title (*yamato*) and the emperor system (*sumera-mikoto*). My article suggested that the term *yamato* first appeared at 668 AD when the *Ōmi* code was issued. In the year 670 AD, Empress *Wu Zetian*, upon learning the change of Japanese Country name, ordered the change from “*Wo*” (*yamato*) into “*Riben*” (*yamato*, *nihon*). In 2011 AD, a *Baiji* soldier’s tombstone “*Ni-jun* epitaph” (d. in 678 AD) was discovered. “*Riben*” was mentioned in the inscription. This was first time the term “*Riben*” ever f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It was also very close to the year 670 AD when Japan was renamed. As far as the Tang Dynasty was concerned, it was evidently that Japan was addressed as “*Riben*” at the year 670 A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name of Japanese country, during the reign of *Tenmu Tennō* (673-686 AD), the previous title for the Japanese King “*ōkimi*” was changed to *Tennō* (*sumera-mikoto*). This change was supported by the newly discovered wooden tablets in Nara area, where the term “*sumera-mikoto*” was inscribed. Thus, the Japanese title for the *Tennō* was first appeared in the Statute of *Kiyomihararyō*, which was compiled in 681 AD. The *Tennō* system was later confirmed and completed in the Statute of *Taihōryō* in 702 AD and the Statute of *Yōrōryō* in 757 AD.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terms “*Riben*”(*yamato*, *ni-hon*) and “*Tianhuang*” (*sumera-mikoto*), we could understand that after the *Taika* reform, Japan had made great efforts to establish a country ruled by law, following the model of the Tang Dynasty. Around the Eighth Century AD, the state-building enterprise of

Japan as a *Ritsuryō* Japan (a country ruled by law and regulations) gradually took the form of *Tianhuang* despotic system with the emperor (*Tennō*) as the supreme leader.

Key words: the name of the Japanese Country, *Tennō* system, Jing Zhen-cheng epitaph, Du Ci-xian epitaph, *Ni-jun* epitaph